

东方文化丛书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著者 / 蒋述卓



K103
3132/6

东方文化丛书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著者 / 蒋述卓



江西人民出版社

6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作 者：蒋述卓 著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九江印刷总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875
字 数：110千
版 次：1990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199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1—3000
定 价：7.40元
ISBN7—210—00871—3/G·21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

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决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

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序

瞿昙之学，自炎汉进入震旦，其布教之广，与佛典之传译不可分。桓帝时，安息人安世高、月支人支类迦讖，先后至中州。安译小乘上座部一系，支译大乘经，特重般若，译学之兴自此昉。两师共译经三十八部，五十五卷，不可谓少。般若之学既行，促使王弼、何晏之玄学，融于佛理，转而又使佛言玄学化。而自支道林至谢灵运诸贤，佛玄双运，恢恢乎与道大适，前此所谓“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者，浸浸乎影响及于文学矣。以佛学阐说我国中古文学思潮者，莫先于沈寐叟，其《海日楼集》中，《止庵诗草序》、《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渔洋生日诗》等所论皆是也。绩溪胡氏，始以佛经翻译论述中古而还之文学，自是以降，以佛学与中国文学作比较探究者，不乏其人，而从佛经传译之进程以考较中古文学思潮，尚未之见。有之，则自蒋君述卓始。君受业王元化教授之门，王氏精通海西文字，并专精我国文学理论，于中古诸家尤邃，中西互证，其精卓为并世学人所推服。君传其法乳，从阐说佛经传译与中古文论发展之血缘为治学之发轫。学成，以《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论文，获华东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今将以此书绣梓问世，属序于予。余子戊辰夏客玄沪之滨，为君主持论文答辩会，得先睹其书以为快。其书分六章，中心在首章，以佛典翻译质文演变之理论为导行之航，驶于中古文化长河中观察之，或尚质，或尚文，归于文质并美之鹄。盖文质之论，六朝文论家门户争执之键钥也，君比而论之，斯盥其脑矣。其征引译经诸贤论述文献，沉沉夥颐。取材也丰而硕，论证也真而谛，盖能以宏观俯视，微观剖析者。其余五章，或论佛经故事与志怪小说，或论玄佛奥旨与山水诗，或论四声与佛经转读，前人或引其端，君文加以开拓或商兑，读之如入花林，时逢异卉。老迈不学如予，抚摩全卷，为之惊叹咋舌，以为得未尝有，是书之刊，将为中古文论史探讨者及编撰者增益新知无疑耳。君英年笃学，由此更进而全面阐说佛典与中国文论，更进而横向展示西方美学与中国文学思潮之消息，为我国文学理论坛坫，大树赤帜，我将翘首以待之矣。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八十二叟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

东方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副 主 编 熊向东 刘国藏 林学勤
执行副主编 林学勤
编 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方 鸣 乐黛云 刘国藏
李 铮 严绍溟 陈 融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林学勤 钱文忠 唐建福
熊向东 魏常海

常 务 编 辑 唐建福
装 帧 设 计 陶雪华
本 书 责 编 游道勤

目录

■ 序	1
■ 前言	1
■ 第一章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4
■ 第二章 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	23
附录《召树屯》与《诺桑王子》同源新证	54
■ 第三章 玄佛并用与山水诗兴起	58
■ 第四章 四声与佛经的转读	89
■ 第五章 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	96
■ 第六章 北朝质朴悲凉文风与佛教	108
附 试论汉魏两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	133

前言

“中古”，在历史研究方面，大多指从汉至唐前这一段时间。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时代的断限一般则断为上起曹魏建安下迄南朝陈亡。使用“中古文学”这一概念，肇自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以后王瑶先生又沿用，写作有《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与《中古文学风貌》三书。笔者此书定名为《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采用的也是刘、王二位先生的“中古文学”概念。

中古时期是一个思想活跃并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起，老、庄风行，佛教输入，从而打破了汉代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名僧与名士执麈尾谈玄论佛潮流的兴起，都促使了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变化。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从哲学高度说，则是人的觉醒，与社会思潮变迁相适应。中古时期的文学思潮也表现出流动多变、丰富多采的特点，在总体趋势上则表现为文的自觉。可以说，整个中古时期的文化所迈出的步子是惊人的。

文化进步的动力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本文研究角

度，则更多地侧重于中外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推动力上。因为，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与渗透，往往给新文化的出现以最大的推动与刺激。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中古文学思潮的嬗变，就不能不正视印度佛教文化对它的影响。

然则，文化又是一个由多元结构组成的整体。研究中古文学思潮与佛教的关系，自然也要将它们与中古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入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除了着眼于中古文学思潮变化过程中直接借鉴和吸收的佛教思想、佛教文学故事以及佛教仪式中的转读等等因素以外，还注意考察在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以后，它对社会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宗教气氛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因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各因素的相互影响，有时往往是潜在的、无形的。当佛教中的哲学、道德、审美诸观念渗入中国文化结构之中后，便会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一部分，然后才在文学思潮的嬗变中折射出来。

佛学与中古文学思潮的关系，鲁迅、陈寅恪、罗根泽、郭绍虞、钱钟书、王瑶、季羨林、王元化、饶宗颐等学者都早有研究，笔者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不少教益与启发。吕澂、汤用彤、方立天、汤一介等学者的佛学著作也给我指出了学佛门津。在沿用上述学者以及其他学人的学术观点时，笔者在书中均一一加以注明，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同时这也是一个青年学子做学问所应有的态度。

笔者初涉佛学，对其思想体系深感钻之弥深，也非我在短时期内即能大有所获。本书只是将我研究佛经译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关系的一些心得体会拿出来，因此也

便不在体系上去考虑了。笔者学力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多多指正。

此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我的导师王元化教授的精心指导，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曾对我作了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叶笑雪先生除了向我提供佛教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以外，还向我传授佛学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方立天教授曾来信对我所请教的佛学问题作了解答；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教授也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其中的部分章节还经他的推荐得以发表；陈谦豫、萧华荣二位老师也对我进行了指导，他们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1]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

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记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又罗、支越（指支谦），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窈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金陵刻经处本）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又罗的意译。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百论序》，《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十一，金陵刻经

处本），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三法度序》，《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十，金陵刻经处本）。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很大。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①，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

^① 佛教教义在五竺竺和西域流传，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显传》也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叱天竺诸国，皆师口传，无本可写”。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授浮屠经之事也可得到证明。